

【企业管理】

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研究

——基于民营企业参政议政的实证分析

胡旭阳¹, 吴一平²

(1. 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2.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提出的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理论假说认为,企业政治资本因构成家族企业独特的战略资源而成为代际传承要素,企业家参政议政“代际接力”是中国家族企业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重要渠道,在转移时机上,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更可能发生在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之后。对中国 282 家上市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上述理论假说:①家族企业创始人参政议政显著增加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②继承人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董事长(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显著增加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还表明:③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存在门槛效应,仅创始人当选地级市及以上级别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才显著增加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④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呈现路径依赖特征,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则继承人更可能通过当选人大代表而非政协委员方式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反之亦然。本文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家族企业非物资要素代际传承的内容,而且从家族代际传承的动态角度丰富了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文献。

[关键词] 家族企业; 企业政治资本; 代际转移; 政治嵌入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6)01-0146-15

一、问题提出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代际传承是最近倍受关注的两个热点研究问题,前者与民营企业参政议政现象有关,后者与中国民营企业主要以家族企业形式存在且进入第一次代际传承高峰有关。然而,目前学术界把二者视为孤立现象,但一些迹象表明二者存在某种关联。一方面,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许多家族企业创始人达到退休年龄,企业步入代际传承阶段,所有权和控制权逐步向第二

[收稿日期] 2015-10-25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政治资本代际转移与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理论机理与浙江经验数据”(批准号 15NDJC013Z);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及其影响家族企业成长机理研究”(批准号 7157217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恒逸基金项目“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研究”(批准号 2015CRPE-HY02)。

[作者简介] 胡旭阳(1969—),男,安徽休宁人,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吴一平(1977—),男,安徽合肥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通讯作者:胡旭阳,电子邮箱:huxuyang@21cn.com。

代转移;另一方面,部分家族企业创始人因企业经济社会贡献获得参政议政资格,而在企业代际传承中,家族二代不但继承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而且在参政议政方面延续父辈的“足迹”,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出现了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和分析上述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呢?

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角度看,创始人有动机把独特要素或资源传递给家族继承人以保“家业长青”,因而创始人将何种要素传承给继承人才有助于“家业长青”,一直是家族企业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1]。已有文献认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是一个多维现象,除了所有权和领导权外,一些非物质核心要素的代际转移也非常重要^[2],比如现有研究已识别出企业家精神^[3]、企业家默会知识或隐性知识^[4,5]等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代际转移对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重要作用。

另外一些文献则指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内容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有关^[6,7]。对于经济转型国家,企业广泛采用基于社会关系的网络型成长战略^[8],企业社会资本或关系资本也成为家族企业代际转移要素^[7,9]。而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政治网络关系构成了民营企业重要的战略资产^[10,11],然而,鲜有文献专门以企业政治网络关系传承为研究对象,仅窦军生^[7]在对企业家关系网络代际传承的研究中涉及了企业家的政府人脉关系的代际传承,但他没有对中国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然而不论是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还是企业家参政议政,都是中国转轨背景下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积累政治资本的途径。

因而,本文提出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理论假说来分析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对政治因素的重视,并认为,类似于企业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关系资本),企业政治资本也构成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为此,本文构建理论模型来揭示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动机、实现渠道和转移时机选择。在实证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不同于窦军生^[7]通过案例研究的定性分析方法来研究基于私人关系的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本文以企业家参政议政为对象来研究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问题,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数据的易获得和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如何获得准确的资料是研究企业政治行为的关键和难点所在^[12],相对于建立在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私人关系基础上的隐性企业政治资本,民营企业企业家参政议政类显性企业政治资本的数据更容易获得,进而有助于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来检验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理论假说。

二、理论构建

1. 企业政治资本的含义及其积累途径

(1)企业政治资本的含义。目前对企业政治资本的定义主要有两个视角:公司政治战略视角和政治嵌入视角。在公司政治战略研究文献中,企业政治资本与企业政治资源的含义相似。Birmer and Witter^[13]把企业政治资本定义为企业拥有的能够通过政治过程影响政府决策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的各种要素组合,这等同于公司政治战略研究领域文献对企业政治资源的定义^[14,15]。

另外一些文献则借鉴社会学的嵌入和社会资本概念来界定政治嵌入和企业政治资本。Prechel^[16]把政治嵌入定义为组织与政府间的联系结构,而 Michelson^[17]把政治嵌入定义为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科层式的、工具性的、情感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个人和组织与政府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企业通过政治嵌入获取资源的能力就形成了企业政治资本^[18,19]。本文主要从政治嵌入视角来分析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问题。

(2)企业政治资本的积累途径。企业政治资本的积累途径与企业政治嵌入方式密切相关,而企业有两种基本的政治嵌入方式:基于私人关系的、非正式的关系型嵌入和正式的、制度化的结构型

嵌入^[17]。①关系型政治嵌入与隐性企业政治资本的积累。关系型政治嵌入是企业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工具性的、情感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可以是先赋性的情感关系,比如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同乡、同学、战友关系;也可以是后致性的工具性联系,比如企业聘请前政府官员出任高管或董事等。关系型政治嵌入主要是基于私人关系,因而属于隐性企业政治资本。②结构型政治嵌入与显性企业政治资本的积累。结构型政治嵌入是企业与政府的科层式联系,因而这类企业政治资本在表现形式上更多是显性的;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积累途径与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行政科层结构密切相关。比如,不同于美国企业通过向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献金实现政治嵌入,在中国政治体制架构下,民营企业的结构型政治嵌入主要表现为企业家参政议政、加入工商联和民主党派等。

从企业政治资本的积累角度看,企业家参政议政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积累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甚至部分文献直接把企业家参政议政与企业政治资本等同起来^[18,20]。下面以企业家参政议政为对象来考察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动机、实现途径和转移时机选择。

2. 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动机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拥有有价值、稀缺、无法复制、难以替代的资源是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21]。因此,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创始人有动机把企业独特的要素或资源传递给家族继承人以保“家业长青”^[1]。而在中国体制转轨背景下,企业政治资本构成了家族企业独特的战略资源进而成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

(1)企业政治资本是中国家族企业重要的、有价值的战略资源。中国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积累政治资本的动机与民营企业发展所处的制度环境有关。在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面临产权保护不充分、政府干预程度高、要素市场不完善等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而这种环境的形成或多或少与政府行为不当有关。作为对所处制度环境的理性反应,民营企业有动机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形成良好的政企关系来管理外部政府环境,促进企业的发展^[10]。现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保护了民营企业的产权^[22];使得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和IPO资格,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20,23,24];降低了关联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的壁垒^[25,26];有助于关联企业获得税收减免和财政补助等政府优惠政策^[27,28]。因而在中国体制转轨背景下,政治关联体现出其作为企业政治资本的“生产性”,构成了中国民营企业重要的战略资产。

(2)企业政治资本是一类独特的、稀缺的战略资产。不同于企业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的单嵌入,企业政治资本是企业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双嵌入”^[18],这决定了企业政治资本不同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特殊属性。在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中,企业可以找到替代方,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可替代性;然而,政府是公共政策唯一的“供给方”,具有垄断性,难以找到替代方,这决定了企业政治资本比一般的企业社会资本更独特、更稀缺。而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资本或关系资本已成为家族企业代际转移要素^[7,9],因而可以推断,家族企业有动机把更独特、更稀缺的企业政治资本传递给下一代。上述推论与窦军生^[7]案例研究所观察到的现象相一致,家族企业创始人和第二代都认为创始人在政府中培育起来的人脉关系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需要向第二代转移。那么,在有动机实施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情况下,家族企业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呢?

3. 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实现渠道

本文认为,对于企业家参政议政类政治资本,家族继承人延续父辈“足迹”获得参政议政资格是实现这类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重要途径。家族继承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相当于创始人为继承人搭建了一个政治平台,继承人可以借助参政议政这个政治平台结识政府官员,构建自

己的政治网络体系。这样即使建立在创始人与政府官员私人关系基础上的企业政治资本因政府官员更迭、创始人退休而逐步丧失价值,继承人还能通过参政议政这个政治平台来更新企业的政治网络关系和政治资本。而创始人的政治嵌入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政治嵌入是组织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科层式的、工具性的、情感的联系^[17]。民营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后,要定期参加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各级人大或政协不定期组织的相关会议,而在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构成中政府官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样,民营企业家通过参政议政这个政治平台可以接触和认识更多的政府官员,使自身嵌入于非正式的个人政治网络关系之中。换言之,民营企业家的结构型政治嵌入给企业家带来了非正式的关系型政治嵌入。而创始人的政治嵌入为家族企业通过继承人参政议政的“代际接力”渠道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国各级人大代表的产生中,人大常委会发挥重要作用,人大代表结构的确定、直接选举选区的划分、提名名单的确定由各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实施^[29]。家族企业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使自已有机会接触、认识本级人大常委会委员,甚至少数民营企业家直接当选县、市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家族企业具有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动机的情况下,创始人的政治嵌入可以增加家族继承人被各级人大常委会考察、提名进而当选人大代表的可能性,促进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实现。

不同于中国各级人大代表通过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中国各级政协委员通过界别协商方式产生。在构成政协委员来源的34个界别中,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经济界、农业界和医药卫生界是企业家进入政协的主要渠道^[29]。家族企业创始人通过工商联等界别当选政协委员,往往会在相应的界别组织中担任职务(比如工商联执委等),这样可以在政协委员产生的界别推荐中直接发挥作用,进而为继承人当选政协委员创造条件,促进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实现。

综上,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的“代际接力”成为家族企业实现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重要渠道。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作为家族企业独特的战略资源,企业家参政议政形成的政治资本构成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成为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实现渠道,这体现为家族企业创始人参政议政显著增加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4. 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时机选择

在企业代际传承的漫长过程中,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更可能发生在哪个阶段呢? 窦军生^[7]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被家族企业视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但在企业外部关系的代际过渡中,企业家同政府部门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往往被放在最后。本文认为,企业家参政议政类显性政治资本代际转移也存在类似现象:在转移时机上,这类企业政治代际转移更可能发生在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继承人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董事长)之后。下面从政治经济互动理论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继承人面临的权威性问题角度来解释为什么这类显性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更可能发生在控制权代际转移之后。

(1)继承人政治权力获得的经济基础与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时机选择。Acemoglu et al.^[30]提出的政治经济互动理论认为,政治权力划分为“正式的政治权力”和“事实的政治权力”,前者来源于正式的政治制度,后者来源于经济资源的配置;两者不但共同决定当前的经济制度,而且还决定未来的政治制度和正式的政治权力。根据政治经济互动理论,企业经济实力是民营企业家获得正式的政治权力(参政议政)的经济基础。在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中,继承人通过参政议政获得正式的政治权力;那么,家族继承人获得正式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显然,继承人担任企业总经理

或董事长意味着继承人至少部分继承了企业控制权,控制权代际转移带来的经济权力成为继承人获得正式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换言之,控制权代际转移为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提供了经济合法性,这意味着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更可能发生在控制权代际转移之后。

(2)继承人面临的权威性问题的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时机选择。家族继承人进入企业后都面临权威性不足的问题,如何构建权威性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面临的重要挑战^[31,32]。而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同样使继承人面临权威性不足的问题。在政企关系中,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或政治人物处于强势地位^[18],这决定了与政府官员或政治人物打交道的最好是企业拥有决策权的“权威人物”。在继承人刚进入企业但尚未树立权威、拥有权力时,如果在这个阶段家族企业实施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由继承人与政府官员打交道,那么,由于继承人不是企业中的“权威人物”,政府官员或政治人物会认为企业对其不重视,权威合法性问题会降低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效果。因而,在企业内部拥有权力和权威是继承人被政府官员认可进而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基础。

而企业权威包括正式权威和职能权威,各自构建途径不一样。正式权威来源于组织内部正式职位和角色,它对组织成员具有强制性,且外部可以观察到;职能权威来源于个人的声望、资历、职业职能等方面,组织成员往往自愿服从职能权威^[31],但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难以观察到。

企业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对继承人权威性关注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内部员工和创业“老臣”不仅关注继承人的正式权威,而且更加关注继承人的职能权威,因为继承人能力不济会使他们的利益遭受损失,而日常企业经营活动便于他们判断继承人是否具有职能权威性。

然而,不同于企业内部员工,信息不对称使政府官员或政治人物难以判断家族企业继承人的职能权威,政府官员更关注打交道的对象在企业中是否拥有正式权威。因而,继承人拥有正式权威有助于继承人被政府官员认可,进而便利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后发挥作用。

而正式权威是正式制度授予的,在组织内部担任相应的职务是获得正式权威的重要途径^[31,32];董事长和总经理是企业最重要的权力位置,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也就成为企业内部正式权威的重要来源。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正式权威可以通过股权转让和管理职位任命直接继承,继承人出任总经理或董事长的企业“权杖交接”成为继承人获得正式权威的重要渠道^[32]。也就是说,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为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提供了权威合法性。

综上,继承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不但为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提供经济合法性,同时也赋予了继承人正式权威进而有助于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后发挥作用。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 2:继承人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显著提高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这源于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在前的策略有助于提升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经济合法性和权威合法性。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样本和数据搜集

本文研究样本为 2013 年末进入代际传承阶段(包括已完成)的上市家族企业。如何界定家族企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存在多个标准和维度^[33],其中,La Porta et al.^[34]以单个自然人至少拥有公司 10%投票权来定义家族企业,并在稳健性检验中把投票权的阈值提升至 20%。参考 La Porta et al.的做法,本文也从最终控制人拥有的控制权角度来界定家族企业。具体地,家族企业指最终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且家族拥有的控制权(投票权)超过 15%的民营上市公司。进入代际传承的上市家族企业指创始人的子女(包括儿子、女儿、女婿和儿媳)2013 年末已在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任职

的家族企业,满足上述条件的上市家族企业共 282 家^①。

本文的研究数据涉及上市家族企业的资产规模、员工数、上市时间、企业代际传承、创始人和继承人参政议政、个人特征等方面的数据,除了资产规模、员工数、上市时间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外,其他数据主要通过手工方式搜集,数据搜集的具体步骤如下:

(1)通过国泰安数据库下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数据,获得 2013 年末所有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数据,并把研究对象界定在最终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超过 15%、且已完成或正在进行代际传承的上市家族企业。

(2)上市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数据搜集。先从年报的董事和高管介绍中获得实际控制人子女是否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管的数据。如果年报没有直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那么,对于实际控制人年龄在 50 岁以上(1963 年以前出生),在年报中寻找与实际控制人同姓且年龄差距在 20 岁以上的公司董事或高管,以“实际控制人姓名+同姓高管或董事姓名+父子(父女)”为关键词进行百度搜索,确定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情况^②。对于年龄在 50 岁以下的实际控制人,通过百度搜索他(她)是否为企业的继承人,确定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情况。

(3)家族企业创始人和继承人参政议政数据的搜集。主要通过百度搜索引擎以“上市公司注册地+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创始人(或家族继承人)姓名”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获得相关数据。此外,对于创始人和继承人的个人特征数据(比如学历、性别等)主要通过手工方式搜集。

2. 模型设计及变量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家族企业创始人参政议政与继承人参政议政关系的研究来寻求支持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理论假说的经验证据,为此建立如下 Probit 模型:

$$\text{Probit}(Spc) = \beta_0 + \beta_1 Pc + \beta_2 Trans + \sum \beta_i Controls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 Spc 为被解释变量, Pc 、 $Trans$ 分别为检验假设 1、2 的解释变量, $Controls$ 代表控制变量的集合, ε 为随机误差项;下面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取值进行说明。

(1)被解释变量(Spc)。以家族企业继承人参政议政表示继承人的政治资本,它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家族企业继承人进入企业后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取值 1,否则为 0。

(2)解释变量。^①创始人政治资本(Pc),用于检验假设 1。本文以家族企业创始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作为创始人政治资本的代理变量,变量 Pc 是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创始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取值为 1,否则为 0。如果家族企业创始人参政议政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就表明存在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②控制权代际转移(变量 $Trans$),用于检验假设 2。该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家族企业控制权是否从创始人向继承人转移。如果继承人在获得政治身份以前已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那么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③;对于没有获得政治身份的继承人,如果 2013 年末担任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变量取值 1,否则为 0。该变量主要用于检验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是否以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为基础。

① 即使把定义家族企业的控制权阈值设定在 20%或 30%,本文的结论也没有发生变化。

② 对于没有与实际控制人同姓且年龄差距在 20 岁以上的、但存在异姓且年龄差距在 20 岁以上的公司,则以“实际控制人+异姓高管或董事姓名+女婿(儿媳)”为关键词搜索;对于实际控制人是女性的,则以“实际控制人姓名+年龄比创始人小 20 岁的董事或高管姓名+母子(或母女、女婿)”进行关键字搜索;确定上市公司的代际传承情况。

③ 对于少数公司,家族企业创始人及其后代都在上市公司中担任董事,则通过后代是否在母公司中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来对 $Trans$ 取值,如果任母公司或集团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则取值 1,否则为 0。

(3)控制变量。①与创始人特征有关的控制变量。与创始人特征有关的控制变量包括:创始人年龄(*Age1*,以2013减去创始人的出生年份)、创始人的性别(*Sex1*,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是否为党员(*Dan1*,是党员取值为1,否则为0)、学位(*Edu1*,如果创始人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取值1,否则为0)、创始人是否加入民主党派(*Demo1*,加入民主党派取值为1,否则为0)。②与继承人特征有关的控制变量。与继承人特征有关的控制变量包括:继承人年龄(*Age2*,等于2013减去继承人出生年份)、继承人性别(*Sex2*,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海外留学经历(*Ab1*,有海外留学经历,取值为1,否则为0)、海外居留权(*Ab2*,有海外居留权,取值为1,否则为0)、是否担任各级青联委员或加入民主党派(*Demo2*,如果是各级青联委员或加入民主党派,取值为1,否则为0)、是否为党员(*Dan2*,如果继承人是党员,取值为1,否则为0)。③省际效应。不同省份的市场化水平、民营企业发展状况有很大差别,为了控制这种异质性的可能影响,本文控制省际效应。在研究样本中,不同省份进入代际传承的上市家族企业数量不同,比如贵州、海南、黑龙江等省份只有1家,因此本文把样本中进入代际传承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足3家的省份作为对照组,最终产生17个虚拟变量来表示省级效应。变量*Num*为本地区(以地级市或直辖市的区为单位)2013年末民营上市公司的数量。④行业效应。按照中国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共引入5个虚拟变量来控制行业效应。⑤与公司特征相关的控制变量。企业家能否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与企业的经济社会贡献有关。本文以企业的资产规模取自然对数(变量*Asset*)和企业雇用员工总数取自然对数(变量*Empl*)来表示企业的经济社会贡献。此外还控制企业的上市时间,变量*Ltime*的取值等于2013减去公司上市的年份。

3. 描述性统计

表1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表1的数据显示,在研究样本中,48.23%的家族继承人已参政议政,81.21%的家族企业创始人曾经或现在仍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55.67%的家族企业继承人已担任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在创始人的个人特征方面,创始人的平均年龄为61.99岁,男性占93.97%,35.82%的企业创始人有本科及以上学历,66.31%的创始人是党员,4.61%创始人加入民主党派。在继承人的个人特征方面,继承人平均年龄为35.75岁,71.98%的家族继承人为男性,32.62%的继承人有海外留学经历,7.8%的继承人拥有海外居留权。

表2的频数统计结果显示,在本文的282家样本企业中,2013年末已完成控制权代际转移(指家族继承人已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董事长)的家族企业为157家(*Trans=1*),继承人已全职进入企业但尚未担任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的企业为125家(*Trans=0*)。

在完成控制权代际转移的157家企业中,115家企业的家族继承人已参政议政;而在上述115家继承人已参政议政的企业中,企业创始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家族企业102家;这表明,102家企业通过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渠道实现了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占总样本企业的36.17%,占已完成控制权代际转移企业的64.96%。由此可见,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并非个例。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理论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

表3是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模型1用于检验假设1,模型2用于检验假设2,模型3同时检验了假设1、2。

表3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①假设1成立。在表3的模型3中,变量*Pc*的系数为1.5692,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Spc</i>	0.4823	0.5006	0.0000	1.0000
<i>Pc</i>	0.8121	0.3913	0.0000	1.0000
<i>Trans</i>	0.5567	0.4976	0.0000	1.0000
<i>Edu1</i>	0.3582	0.4803	0.0000	1.0000
<i>Sex1</i>	0.9397	0.2384	0.0000	1.0000
<i>Age1</i>	61.9929	6.7338	46.0000	79.0000
<i>Dan1</i>	0.6631	0.4734	0.0000	1.0000
<i>Demo1</i>	0.0461	0.2101	0.0000	1.0000
<i>Edu2</i>	0.4219	0.4947	0.0000	1.0000
<i>Sex2</i>	0.7198	0.4498	0.0000	1.0000
<i>Age2</i>	35.7482	6.6886	23.0000	54.0000
<i>Dan2</i>	0.1950	0.3969	0.0000	1.0000
<i>Demo2</i>	0.1241	0.3303	0.0000	1.0000
<i>Ab1</i>	0.3262	0.4696	0.0000	1.0000
<i>Ab2</i>	0.0780	0.2686	0.0000	1.0000
<i>Asset</i>	21.6448	0.9995	17.8226	24.8994
<i>Empl</i>	7.4262	1.0728	3.6635	11.1202
<i>Ltime</i>	6.2234	5.5645	1.0000	21.0000
<i>Num</i>	23.3617	26.4925	1.0000	127.00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Stata 软件计算整理。

表 2 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的频数统计

<i>Spc</i>	<i>Trans</i>	0			1			合计
		<i>Pc=0</i>	<i>Pc=1</i>	合计	<i>Pc=0</i>	<i>Pc=1</i>	合计	
0	0	25	79	104	15	27	42	146
1	1	0	21	21	13	102	115	136
	合计	25	100	125	28	129	157	282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样本数据整理。

大于 0 且在 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家族企业创始人参政议政显著增加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中国上市家族企业存在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现象。②假设 2 成立。在表 3 的模型 3 中,变量 *Trans* 的系数为 1.3940,大于 0 且在 1%水平上显著,家族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显著增加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综上,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支持本文的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理论假说。

在家族企业创始人的个人特征方面(以模型 3 为基准),变量 *Age1* 的系数为 0.0865(5%水平上显著),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与家族企业创始人年龄正相关;创始人年龄越大,家族企业越可能进入“权杖”交接阶段;显然,相对于尚未进入“权杖”交接的家族企业,进入“权杖”交接阶段的家族企业更可能进行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

在家族继承人的个人特征方面,变量 *Sex2* 的系数为 0.6559,显著大于 0,男性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大于女性继承人,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继承人为男性的家族企业更可能进

表 3 继承人参政议政影响因素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常数项	-11.8757***	-3.62	-11.2459***	-3.35	-14.1224***	-3.88
<i>Pc</i>	1.2649***	3.38			1.5692***	3.51
<i>Trans</i>			1.2601***	4.98	1.3940***	4.99
<i>Edu1</i>	0.2088	0.86	0.1928	0.78	0.3701	1.40
<i>Sex1</i>	-0.4096	-0.81	-0.3023	-0.56	-0.7710	-1.34
<i>Age1</i>	0.0618*	1.83	0.0629*	1.75	0.0865**	2.22
<i>Dan1</i>	0.2631	0.94	0.0092	0.03	-0.1128	-0.37
<i>Demo1</i>	-1.1577**	-2.00	-0.9393*	-1.66	-1.3185**	-2.19
<i>Edu2</i>	0.1704	0.70	0.1031	0.41	0.2667	0.98
<i>Sex2</i>	0.8407***	3.19	0.7301***	2.63	0.6559**	2.26
<i>Age2</i>	0.0788**	2.23	0.0354	0.94	0.0384	0.96
<i>Dan2</i>	1.1084***	3.44	0.8693**	2.59	0.7828**	2.27
<i>Demo2</i>	0.5568	1.46	0.5733	1.47	0.4635	1.15
<i>Ab1</i>	-0.0787	-0.30	-0.0933	-0.35	-0.2555	-0.91
<i>Ab2</i>	-1.3707**	-2.42	-1.6426***	-2.92	-1.3717**	-2.22
<i>Ltime</i>	0.0499**	2.03	0.0445*	1.75	0.0451*	1.73
<i>Asset</i>	0.1404	0.95	0.1619	1.09	0.1972	1.26
<i>Empl</i>	-0.0324	-0.26	0.0720	0.57	0.0027	0.02
<i>Num</i>	-0.0091	-1.55	-0.0133**	-2.11	-0.0119*	-1.80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 ²	0.4674		0.5057		0.5451	

注:*, **,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 Stata 软件计算整理。

行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这可能与中国“重男轻女”文化传统有关。变量 *Dan2* 的系数为 0.7828,显著大于 0,继承人的党员身份与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继承人党员身份增加了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可能性。变量 *Ab2* 的系数为-1.3717(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继承人的海外居留权降低了其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原因在于海外居留权或海外移民使继承人不具备参政议政的资格,进而降低了家族企业通过参政议政“代际接力”渠道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可能性。

2. 理论假设的进一步检验

中国企业家参政议政包括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两个类别,它们的产生机制不一样,人大代表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而政协委员主要通过界别协商推荐产生;同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有不同的级别:乡(镇)级、县级、地市级、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下面进一步分析创始人参政议政的类型和级别差异是否会对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产生不同的影响。

(1)创始人参政议政的类型与级别差异对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影响。①企业家参政议政类别差异的影响。由于本文的解释变量并没有区分创始人是当选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这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引入变量 *F_ren*、*F_wei* 来替换 *Pc*,以考察解释变量的不同类型对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其中 *F_ren* 为虚拟变量,如果创始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取值

1, 否则为 0; F_{wei} 也为虚拟变量, 如果创始人当选各级政协委员, 取值 1, 否则为 0。表 4 第 2、3 列是以变量 F_{ren} 、 F_{wei} 替换变量 Pc 后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由于篇幅限制的原因, 表 4 第 2、3 列仅给出了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 变量 F_{ren} 、 F_{wei} 的系数分别为 0.2411、0.3873, 均显著大于 0; 这表明, 创始人不论是当选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 均提高了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假设 1 仍成立。变量 $Trans$ 的系数为 1.4145, 大于 0 且在 1%水平上显著, 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增加了家族企业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假设 2 仍成立。②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级别问题。本文把创始人是否参政议政作为父辈政治资本的代理变量, 这可能会带来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 因为本文没有区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级别的可能影响。为此, 本文引入四个虚拟变量 F_{pc1} 、 F_{pc2} 、 F_{pc3} 、 F_{pc4} 来代替解释变量 Pc , 它们分别表示创始人当选县级(及以下)、地市级(含直辖市的区)、省级(直辖市)和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创始人未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作为对照组, 来分析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影响因素, 以检验理论假设是否成立。表 4 的第 4、5 列是考虑创始人参政议政级别后的分析结果(限于篇幅的限制, 分析结果也只包含解释变量)。

表 4 第 4 列的分析结果表明, 变量 F_{pc2} 、 F_{pc3} 、 F_{pc4} 的系数分别为 1.7219(1%水平上显著)、1.8930(1%水平上显著)、1.4392(5%水平上显著), 家族企业创始人当选地级市、省级、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显著增加家族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进而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 而变量 F_{pc1} 的系数为 -0.6043, 小于 0 但统计上不显著, 创始人当选县级及以下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对家族继承人的参政议政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 总体上, 假设 1 是成立的; 以上结果还表明, 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存在“门槛”效应, 即创始人当选地级市及以上级别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才显著提高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此外, 变量 $Trans$ 的系数为 1.5216(1%水平上显著), 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增加了家族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 假设 2 仍成立。

表 4 理论假设进一步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	解释变量的类型差异		解释变量的级别差异		被解释变量为 S_{ren}		被解释变量为 S_{wei}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常数项	-10.0999***	-2.91	-14.5981***	-3.75	-11.3878***	-2.97	-5.0547*	-1.68
F_{pc1}			-0.6043	-1.38				
F_{pc2}			1.7219***	3.41				
F_{pc3}			1.8930***	3.57				
F_{pc4}			1.4392**	2.38				
F_{ren}	0.2411**	2.19			0.2322**	1.99	0.1104	1.22
F_{wei}	0.3873***	2.81			-0.3048**	-2.06	0.4085***	3.55
$Trans$	1.4145***	5.21	1.5216***	5.12	1.2299***	3.62	0.7614***	2.9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 ²	0.5315		0.5531		0.4037		0.3027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Stata 软件计算整理。

由此可见, 在考虑了创始人参政议政的类型和级别差异后, 本文的假设仍旧成立; 而且上述分析结果还显示, 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存在门槛效应。

(2) 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实现机制的进一步讨论。本文认为, 创始人的政治嵌入是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关键所在。比如, 家族企业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使自己有机会接触、认识本级

人大常委会委员,这样可以增加继承人被各级人大常委会考察、提名进而当选人大代表的可能性。在上述创始人政治嵌入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如果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那么创始人的政治嵌入使继承人更可能通过当选人大代表而非政协委员方式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反之,如果创始人当选政协委员,那么继承人更可能通过当选政协委员而非人大代表方式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如果上述推论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进一步说明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下面分别以继承人当选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检验上述推论是否成立。①以继承人是否当选各级人大代表作为被解释变量(变量 S_{ren})。如果继承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那么变量 S_{ren} 取值 1,否则为 0。表 4 第 6、7 列为以继承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来表示企业政治资本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变量 F_{ren} 的系数为 0.2322(5%水平上显著),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显著提高了继承人当选人大代表的可能性; F_{wei} 的系数为-0.3048(5%水平上显著),创始人当选政协委员则显著降低了继承人通过当选人大代表而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可能性;这表明,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类政治资本更可能通过继承人当选人大代表而非政协委员的渠道实现代际转移。变量 $Trans$ 的系数为 1.2299(1%水平上显著),假设 2 仍成立。②以继承人是否当选各级政协委员为被解释变量(变量 S_{wei})。如果继承人当选各级政协委员,变量 S_{wei} 取值 1,否则为 0。表 4 第 8、9 列为以继承人当选各级政协委员来表示企业政治资本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变量 F_{ren} 的系数为 0.1104,大于 0 但统计上不显著,企业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对继承人能否当选政协委员没有显著影响;相反,变量 F_{wei} 的系数为 0.4085(1%水平上显著),创始人当选政协委员显著提高继承人当选政协委员的可能性。这表明,对于创始人当选政协委员类政治资本则更可能通过继承人当选政协委员而非人大代表的方式实现代际转移。变量 $Trans$ 的系数为 0.7614,大于 0 且在 1%水平显著,假设 2 也成立。

上述分析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创始人的政治嵌入在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中的重要作用,并表明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呈现路径依赖特征;对于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类企业政治资本,更可能通过家族继承人当选人大代表而非政协委员的渠道实现代际转移;反之亦然。

3. 稳健性分析

(1)除了控制现有文献所强调的影响企业家参政议政的众多因素之外^[15-29],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以往文献没有考虑的因素:创始人子女是否有海外留学经历和海外居留权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试图采用倾向值配对方法来缓解这一问题^[35]。本文使用倾向值将创始人有政治资本与没有政治资本(配对变量 Pc)、继承人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与没有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配对变量 $Trans$)的个体分别加以配对,进而采用核匹配(Kernel Matching)方法估计上述两组群体之间的平均差距。倾向值是利用 Probit 模型来估计的,估计结果见表 5。表 5 第 2 列是以创始人是否有政治资本进行配对的估计结果。与创始人没有政治资本的群体相比,父辈拥有政治资本的继承人更可能参政议政,假设 1 成立。表 5 第 3 列是以继承人是否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进行配对的估计结果。与没有担任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的群体相比,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继承人更可能参政议政,假设 2 成立。

(2)继承人的政治资本是来自父辈的代际转移还是继承人自身努力积累的结果。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继承人的政治资本来自代际转移,其中继承人参政议政是家族企业实现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重要渠道。但部分家族企业在第二代的领导下取得了快速成长,企业继承人也取得相应的政治身份,因而继承人政治身份的取得和政治资本的积累可能源自自身努力而非企业创始人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结果。比如浙江传化集团创始人为徐传化,1995 年徐传化的儿子徐冠巨担任传化集团总

表 5 稳健性分析结果

内生性问题的倾向配对方法检验结果			继承人政治资本获得渠道稳健性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 <i>Spc</i>	配对变量: <i>Pc</i>	配对变量: <i>Trans</i>	解释变量	样本 1	样本 2
系数	0.2611**	0.3414***	<i>Pc</i>	1.4769***	1.3404***
标准差	(0.1126)	(0.0834)	<i>Trans</i>	1.4144***	1.3343***
处理组样本数	229	157	样本数	202	231
控制组样本数	53	125	Pseudo R ²	0.4953	0.5018

注:在内生性问题的倾向配对方法检验结果中,括号内是标准差;继承人政治资本获得渠道稳健性分析结果只给出了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省略;*、**、***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Stata 软件计算整理。

裁,2001 年担任传化集团董事长,在徐冠巨的带领下传化集团规模迅速扩大,而徐冠巨也于 2003 年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因而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可以视为自身努力而非父辈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结果。如果这种现象比较普遍,那么,本文提出的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理论假设就不成立,因而需要排除这种可能性。

继承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参政议政的企业往往是创始人已经彻底退休,继承人已全面接班,企业的代际传承在本文的研究样本截至时间 2013 年底已完成。为此,本文把家族第二代已担任董事长的家族企业从样本中剔除,在剩余的样本企业中,控制权代际转移是指家族继承人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者企业尚未进入控制权代际转移阶段,创始人仍担任董事长或其他职务,因而企业的经济社会贡献不可能完全归功于继承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理论假设还成立,那么可以进一步确认继承人政治资本的获得在更大程度上来源于代际转移而非继承人自身努力的结果。表 5 第 5 列为新样本(样本 1)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样本减少至 202 家;由于篇幅的限制,表中只给出了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 5 第 5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①变量 *Pc* 的系数为 1.4769(1%水平上显著),创始人参政议政显著增加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假设 1 仍旧成立;②变量 *Trans* 的系数为 1.4144(1%水平上显著),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显著增加了家族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假设 2 也是成立的。

下面,进一步从人的生命周期角度来论证继承人的政治资本更可能来自代际转移。人的精力、思维能力、健康状况等会随年纪增加而下降,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随着年龄的增加,家族企业创始人对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和重大决策的作用会不断下降,相反继承人则因年富力强而在企业管理和决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对于创始人年龄非常大的家族企业,企业的经济社会贡献可归因于继承人,这类企业继承人的参政议政可视为继承人自己努力的结果。为此,本文把创始人年龄超过 70 岁的家族企业从样本中删除,表 5 第 6 列为新样本(样本 2,样本数减少至 231 家)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①。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变量 *Pc*、*Trans* 的系数分别为 1.3404(1%水平上显著)、1.3343(1%水平上显著),均显著大于 0,因而假设 1、假设 2 仍成立。

五、结论与启示

1. 结论

本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作为企业独特的、稀缺的战略资源,家族企业创始人有动机把积累的企业政治资本传递给继承人以增加“家业长青”的期许,企业政治资本构成了家族企业代际转移要素;②在中国经济政治体制转轨背景下,民营企业企业家参政议政是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

① 即使把本文样本中创始人年龄超过 65 岁的家族企业从样本中删除,本文的理论假设仍旧成立。

联、积累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对于企业家参政议政类政治资本,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是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重要渠道;这体现在创始人参政议政显著增加了继承人参政议政的可能性。③企业创始人的政治嵌入是家族企业实现参政议政类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关键所在;这体现在,创始人当选人大代表则继承人更可能通过当选人大代表而非政协委员方式实现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反之亦然。创始人的政治嵌入使中国家族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呈现路径依赖特征。④在时机选择上,企业控制权代际转移先于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继承人担任企业总经理或董事长显著提高了他们参政议政的可能性。这种控制权代际转移在前的策略提升了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的经济合法性和权威合法性。

2. 研究启示

(1)从理论发展角度看,本文的研究为继续探索政治关联影响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的理论机理提供了新视角。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表明部分家族企业已成功实现了企业政治资本的代际转移,因而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对家族企业持续成长有何影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一些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影响民营企业成长机制之一就是降低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36];而与企业创始人相比,家族继承人并不一定具备创始人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能力,在外部竞争压力的驱使下,继承人是否会利用家族传承的企业政治资本进行寻租而非创新创业从而进一步抑制家族企业的创新活动,是未来研究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对家族企业持续成长影响的重要方向。

(2)在政策上,需要防范长期政商联盟的形成。相对于公众公司高管的频繁更迭,家族的代际传承有助于家族企业兑现对官员的那些无法公开的承诺,从而有助于长期政商联盟的形成;而家族企业与政治人物结盟会激励家族企业利用政治关系进行寻租而非从事创新创业活动,进而制约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37]。家族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参政议政“代际接力”现象表明对长期政商联盟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来防范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带来的不利影响。

而家族企业之所以在代际传承中对企业政治资本传承的重视与中国市场体系不健全和政府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高有关。追本溯源,要防范企业政治资本代际转移带来的微观和宏观层面的不利影响,关键还在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要素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使企业的发展更多依靠市场而非“找市长”。只有这样,才能使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中把更多精力用在人力资本、默会知识而非企业政治网络关系的代际转移上,进而促进家族企业持续、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 [1] 窦军生,贾生华. “家业”何以长青? ——企业家个体层面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的识别[J]. 管理世界, 2008, (9):105-117.
- [2] Dorzdow, N. What Is Continuity[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998,11(4):337-347.
- [3] Lambrecht, J. Multi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Family Business: A New Explanatory Model [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5,18(4):267-282.
- [4] Cabrea-Suarez, K., P. De Saa-Perez, and D. Garcia-Almeida. The Succession Process from a Resource-based and Knowledge-based View of the Family Firms[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1,14(1):37-47.
- [5] 窦军生,李生校,邬家瑛. “家和”真能“万事”兴吗? ——基于企业家默会知识代际转移视角的一个实证检验[J]. 管理世界, 2009,(1):108-120.
- [6] Handler, W. C. Succession in Family Busines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994,7

- (2):133-157.
- [7] 窦军生.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企业家默会知识和关系网络的传承机理研究[D]. 浙江大学, 2008.
- [8] Peng, M. W., and Y. Luo.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43(3):486-501.
- [9] Steier, L. Next-generation Entrepreneurs and Success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Modes and Means of Managing Social Capital[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1,14(3):259-276.
- [10] 罗党论,唐清泉.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 2009,(2):106-118.
- [11] Li, H. Y.,and Y. Zhang. The Role of Managers' Political Networking and Functional Experience i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28(8):791-804.
- [12] 张建君. 嵌入的自主性:中国著名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J]. *经济管理*, 2012,34(5):35-45.
- [13] Birner, R., and H. Witter. Using Social Capital to Create Political Capital [M]. Cambridge and London:MIT Press, 2003.
- [14] Fryans, J. G., G. A. Pigman, and K. Mellahi. First Mover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rm-specific Political Resour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27(4):321-345.
- [15] 卫武. 中国环境下企业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和政治绩效及其关系研究[J]. *管理世界*, 2006,(2):95-107.
- [16] Prechel, H.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Embeddedness on Financial Malfeasance in the Largest U.S. Corporations: Dependence, Incentives and Opportunitie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0,75(3):331-354.
- [17] Michelson, E. Political Embeddedness and Institutional Continuity i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113(2):352-414.
- [18] Nee, V.,and S. Opper. Political Capital in a Market Economy[J]. *Social Force*, 2010,88(5):2105-2132.
- [19] Sun, P., H. Xu, and J. Zhou. The Value of Local Political Capital in Transition China [J]. *Economic Letters*, 2010,110(3):189-192.
- [20] Zhou, W. Bank Financing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 The Payoffs of Political Capital [J]. *World Development*, 2009,37(4):787-799.
- [21]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17(1):99-120.
- [22] 田利辉,张伟. 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效应[J]. *经济研究*, 2013,(11):71-86.
- [23] 胡旭阳.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民营百强为例[J]. *管理世界*, 2006,(5):107-113,141.
- [24] 胡旭阳,刘安超. 政治关系与民营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市场准入[J]. *财经论丛*, 2011,(4):62-68.
- [25] 罗党论,刘晓龙. 行业壁垒、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J]. *管理世界*, 2009,(5):97-106.
- [26] 胡旭阳,史晋川. 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投资——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4):5-14.
- [27] 郭剑花,杜兴强. 政治联系、预算软约束与政府补贴的配置效率——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 *金融研究*, 2011,(2):114-128.
- [28] 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 *经济研究*, 2008,(7):130-142.
- [29] 陈钊,陆铭,何俊志. 权势与企业家参政议政[J]. *世界经济*, 2008,(6):39-49.
- [30]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A]. Aghion, P.,and S. Durlauf.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C]. Amsterdam: Elsevier,2005.
- [31] 李新春,韩剑,李炜文. 传承还是另创领地:家族企业二代继承的权威合法性构建[J]. *管理世界*, 2015,(6):110-124.

- [32]杨学儒,朱沆,李新春. 家族企业的权威系统与代际传承[J]. 管理学报, 2009,6(11):1492-1500.
- [33]Villalonga, B., and R. Amit. How Do Family Ownership, Control and Management Affect Firm Valu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80(2):385-417.
- [34]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nd A. Shleifer.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 *Journal of Finance*, 1999,54(2):472-517.
- [35]Heckman, J. J., I. Ichimura, and P. E. Todd. 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8,65(2):261-294.
- [36]党力,杨瑞龙,杨继东. 反腐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7):146-160.
- [37]Morck, R., B. Yeung, and C. Yu. Corporate Governance, Economic Entrenchment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5,43(3):657-722.

Study on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Political Capital of Chinese Family Firm—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Entrepreneurs' Membership of PC or CPPCC

HU Xu-yang¹, WU Yi-ping²

- (1. School of Financ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China Public Finance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puts forth corporate political capital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er hypothesis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transgenerational relay of the PC or CPPCC membership between founders and their descendants of Chinese family firms. The hypothesis argues that corporate political capital consists of unique strategic resource of Chinese family firms and then becomes the factor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the transgenerational relay of PC or CPPCC membership is the channel to realize 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corporate political capital for Chinese family firms, and the transgenerational heritage of control in advance brings about economic and authority legitimacy to 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political capital. The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corporate political capital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er hypothesis. Firstly, founder being the member of PC or CPPCC increa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descendant to be the member of PC or CPPCC. Secondly, family firms generally take following transfer strategy that the transgenerational heritage of control (the descendants being the CEO or the chairman of board of directors) takes place before 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political capital, which brings economic and authority legitimacy to 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political capital of family firm. Thirdly, the further evidences also show that in 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political capital, there is threshold effect that only the founder being the member of PC or CPPCC of prefectural-level city or above does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his descenda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discussion of state affairs. Fourthly, there is path dependence in the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corporate political capital that founder being the member of PC increa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descendant becomes the deputy of PC instead of the deputy of CPPCC and vice versa. Our research enriches not only the research on the transfer content of non material factors of family firm, but also the literature on political connection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of family firm'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er.

Key Words: family firm; firm political capital; transgenerational transfer; political embeddedness

JEL Classification: G34 L14 P16

[责任编辑:覃毅]